

---

# 吕振羽和湖南文化抗战

范忠程

---

全面抗战爆发后,湖南成了战略后方。北平、上海、南京等地许多文化教育机关内迁湖南,大批文化名人,学者随之荟萃长沙;一些在外地工作、学习的著名湘籍文化人和大学生,也分别从平、津、沪、宁、汉回湘。他们与长沙的文教界人士汇合,满怀抗战激情,开展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。古城长沙增添了抗日救亡的实力与炽热的文化抗战氛围,成了闻名全国的抗战“文化城”。本文以吕振羽和湖南文化抗战为题,对抗战初期吕振羽在湖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中的地位 and 作用,做些个案研究。

## 一 抗战文化的重要传人

湖南曾是大革命的高潮地区。然而,1927年后,“经过近10年的磨折”,“以强悍坚韧而富于敏感的三湘民气……已经无甚生气”了。全面抗战爆发后,湖南以何键为首的省政府,仍旧“蹈常袭故”,“诸凡行政机构,社会组织,教育方法等,依旧保持原有的状态”。对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团体及其活动,不予支持,扶助,甚至以“有害于抗战”的名义加以压制和取缔,“迫令长沙报纸不得散发有关日寇在华北继续步步进逼的号外”。

---

范长江:《湖南对抗战之政治准备》,汉口《大公报》1938年7月20日。

范长江:《湖南对抗战之政治准备》,汉口《大公报》1938年7月20日。

《湖南省志》(第一卷),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,第731页。

为了改变这种“沉沉暮气”和“麻木不仁”的落后局面，唤起湖南人民被压抑的爱国热情，组织千百万民众投入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，中国共产党于抗战初期，先后从华北、延安派出多批干部，来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。吕振羽最先派回湖南。

吕振羽是著名的抗日活动分子。九一八事变后，他在平津地区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抗日言论。1935年，他担任抗日进步团体“北平市自由职业者大同盟”的书记，因而被日本特务机关视为“抗日排日之主动者”。七七事变前夕，在敌特确定要捕杀的“五百余人名单中”，他是被“看得分外重要必欲得而甘心的一个”。平津沦陷，吕振羽被困北平。脱险以后辗转来到南京，接周小舟从延安来信称：“家父嘱，盼兄速回湘开荒。”传达了中央派吕速回湖南开辟抗日工作的指示。

9月，吕振羽抵达长沙，受到省城“新闻界朋友”及“学术界”“故知”的“热情欢迎”。湖南《大公报》约请他将卢沟桥“事变经过及平津现状”的“一些见闻”，“用文字报告”出来。长沙《前进》周刊介绍：吕先生“是一位研究社会史的专家，著作非常丰富”，“不单是专在纵的历史方面下功夫，而且还对横的社会问题，有极精密的观察和分析”；《前进》创刊之时，“他刚巧回到长沙”，“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指教”。

12月初，徐特立、王凌波受中共中央指派，由延安来到长沙，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，开展抗日统战工作。同月下旬，高文华、聂洪钧、任作民、郭光洲等来湖南。1938年1月，以高文华为首的中共湖南省工委正式成立。吕振羽在徐特立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下，积极开展抗日文化工作。他先后在湖南《大公报》《力报》《通俗日

---

吕振羽：《脱险归来》，湖南《大公报》1937年9月18日。

此时，周小舟调中共中央军委，任毛泽东的秘书。

陈允豪等：《一石压江流——史学家吕振羽》，《人物》1981年第2期，第135页。

吕振羽：《脱险归来》，湖南《大公报》1937年9月18日。

《编辑后记》，《前进》周刊创刊号，1937年9月18日。

报》《民国日报》长沙《前进》周刊、《中苏》半月刊、《文化批判》、《民族呼声》《联合旬刊》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文章 30 多篇,出版了《抗战的前途》等小丛书。他以丰厚的历史知识,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,宣传了中共的抗战路线、方针和政策;分析了抗战爆发后敌我形势和抗战前途;批驳了一些不利于抗战的错误言论。他的文章高屋建瓴,论说深刻,为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启蒙。

首先,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狼子野心,指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。吕振羽的文章说: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略者发动的“并吞全中国,灭亡全中国民族”的“侵略战争”。“是日本侵略主义之一种有计划的行动”,是“东西(方)各侵略主义国家共同破坏世界和平的序幕”。“日本帝国主义打算灭亡中国,已经有着很久的准备,日寇所谓‘大陆政策’,便是敌人灭亡中国的一套阴谋”。它“这回进攻我们……就是实行灭亡中国的最后一次战争”。若是其阴谋得逞,“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,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”,我们的“子子孙孙要做人家的牛马和奴隶”;“我们的文明种族,也就要从此绝灭的。这真是中华民族生死祸福的‘最后关头’。”这些言论,令人触目惊心,催人奋起救亡,在抗战初期,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。

其次,分析了敌我形势,批驳了“唯武器论”等错误观点,鼓舞人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。吕振羽在《抗战的前途》一书中说:目前“我们是一个弱国”,经济、政治、军事都很落后。正因为这样,敌人“认为很容易下手来灭亡中国”。“可是中国本身具有众多的人口、丰富的资源、储藏有种种伟大的力量,这就不如日寇所想象,能

---

吕振羽:《抗战后的新动向》,《前进》周刊创刊号,1937年9月18日

吕振羽:《脱险归来》(连载),湖南《大公报》1937年9月19日。

吕振羽:《抗战的前途》(《抗战小丛书》第1册),1938年2月,第1页。

吕振羽:《抗战的前途》,第4页。

吕振羽:《抗战的前途》,第2页。

够容易来灭亡的”。他认为,中国的落后是短暂的。只要把人力物力动员、组织起来,力量是强大的,而“日本是小国”,“资源缺乏”,“兵力不足”,“军需供应困难”……这些短处是敌人无法克服的“致命弱点”。正因为如此,“九个月的战争”,导致了敌国的“经济困难,民众生活恶化”;在日本人民中,出现了“反战厌战情绪”和“反内阁的洪潮”。这证明:中国虽弱,但深蕴着内力;敌人虽强,却潜伏着危机。敌强我弱的格局,是暂时的、相对的、可变的。他说:从七七事变到“八一三”抗战前,不少人根据“中国武器不如敌人”的现状,发表“唯武器论”的反战理论,“传染”和“影响”了一些人;还有人自作聪明,“说现代战争是经济战争”,中国落后,“无法战胜日本”,散布“失败主义”和“恐日病”。他指出:这两种论调“从政治上说,都是由汉奸托派亲日派散布出来的”。我们不否认日军的武器强过我们,但是,“死的器械是要活的人去使用的”。矶谷师团是“敌国有名的精锐,具有高度机械化装备的军队”。台儿庄战役中,“竟为我军所消灭”。它“确证了唯武器论是根本错误的”。台儿庄一战,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,是因为我们的抗战是“为争生存、争解放而战,故我军英勇胜过敌人”。至于装备,我们可“从他国输入更精良的武器”,从国外引进“机器”“技术家”,自造武器,“渐次做到国防自给”。吕振羽承认,“半殖民地半封建的”中国经济“远落后”于“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”日本经济。但在战时,经济不能离开政治、军事、外交而“单独发生作用”。在政治、军事上“我们是抵抗侵略,是救民族解放”,因而在外交上得到欧美民主国家的广泛同情,经济上“得到各国的援助”和国内

---

吕振羽:《抗战的前途》,第3页。

吕振羽:《抗战的前途》,第23—27页。

吕振羽:《抗战情势讲话》,《中苏》半月刊第3期,1938年4月15日,第2页。

吕振羽:《抗战的前途》,第18、20页。

吕振羽:《抗战的前途》,第21页。

吕振羽:《抗战情势讲话》,《中苏》半月刊第3期,1938年4月15日,第2页。

吕振羽:《抗战的前途》,第21页。

“人民的合作”。而且，由于我们坚持抗战，因而推进了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各方面的“进步”，“国际地位”也“一天一天在提高”。然而，我们的敌人由于战争的“侵略性”，作战手段的“野蛮性”，“盗匪式的掠夺性”，因而遭到全世界的反对。“随着战事的延长”，其军事经济力将“日益削弱”；国内的政治“危机日益严重”；“国际关系日益恶化”；国际地位“日益堕落”，现在已“无以支持其‘光荣的孤立’”。随着战争的发展，敌人是“一天一天在接近失败”，“替自己在挖掘坟墓”。总之，吕振羽认为：“在客观上”，“我们有战胜日本的条件。”这些分析和批驳，帮助人们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，从而提高了湖南人民的抗日自觉性和必胜的信心。

其三，激发同胞爱国热情，号召支前参战。吕振羽回长沙后，即将他在天津、烟台、济南、南京沿途所见各地同胞踊跃支援抗战的动人情景，写成文章发表在湖南《大公报》等报刊上。文章说：“那些没有过夜粮的黄包车夫们，都在争先恐后地去担任义务的运输工作；大群女孩子们都加紧在缝纫绷带和药包以及伤兵的看护工作；学生们更是全体动员在分别担任前方后方的种种勤务；一些平日钻死书的教授，也都兴奋地离开他们的研究室去参加工作了；一般民众都自动地把他们日用的东西捐作军用；商人也对其附近的战士，自动的去供给食品和慰问……”这些地方的同胞，不论男女老幼，不分前方后方，不问工农学商，每个人都为抗日在做“各种各样的战斗工作”。吕振羽在叙述这些见闻的同时还指出：抗战事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，我们“每一个人都应当振奋起来，把全副的精神和力量，统统集中于抗战，交付于抗战”；无分前方、后方，“随

---

吕振羽：《抗战的前途》，第 22 页。

吕振羽：《伟大的战争！伟大的胜利！》，《中苏》半月刊第 9、10 期合刊，1939 年 8 月 1 日，第 6、8 页。

吕振羽：《抗战的前途》，第 29 页。

吕振羽：《脱险归来》，湖南《大公报》1939 年 9 月 23 日。

吕振羽：《脱险归来》，湖南《大公报》1939 年 10 月 5 日。

时随地去为抗战效劳”。他强调：这次抗战是“全民族的长期抗战”，“除去汉奸以外，不管他是工人、农民、商人、学生、资本家、地主、僧道、自由职业者……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”，“都有参加抗战的权利和义务”，都要用各种方法“组织起来”，“积极参加抗战”。如此，“我们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就有万二千分的把握”。他呼吁：“每个忠诚为国的黄帝子孙，都应该时时把亡国的利害超越其他一切利害”，“各党各派各阶层”，“牺牲其一切不必要的成见，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于抗战的主观努力上来”；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下，“自觉地加强”“统一”与“团结”，“完成战区和临战区的民众组织训练与武装”，“完成后方一切人力和物力的动员工作”。吕振羽的全民抗战思想，对推进湖南人民的抗日觉醒，促进各抗日党派、团体的联合，加快抗日救亡的准备，作了重要的动员。

其四：说明湖南、湖南人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全面抗战爆发时，吕振羽就预见到：“湖南在国防地位上，将随着战争的发展而益形重要。”此后不久，他在《战时的湖南与湖南人》《保卫武汉与巩固湖南》等文章中，又从湖南所处地理环境、湖南人文历史的特点，对湘人在自卫抗战中肩负的历史使命，作了深层次的阐释。文章说：湖南“介于湖北、江西、广东之间，是粤汉、浙赣及尚未完成的湘桂、湘黔诸铁路干线的交点，又是西南公路交通的枢纽”。占有湖南，可北攻武汉，南制两广，西取川黔，东进浙赣。湖南物厚人丰，战时是“前方人力和物力”“最主要的供给泉源”，所以，它“历来是华中和华南和军事冲要”。近百年来，“每次战争中几乎都

---

吕振羽：《抗战的前途》，第 5 页。

吕振羽：《抗战的前途》，第 17 页。

吕振羽：《坚决‘否认伪组织’和‘厉行肃清汉奸’！》，《中苏》半月刊第 4 期，1938 年 5 月 1 日，第 3 页。

吕振羽：《敌国内阁的改组和今后战局的估量》，《中苏》半月刊第 7 期，1938 年 6 月 15 日，第 7 页。

吕振羽：《抗战后的新动向》，《前进》周刊创刊号，1937 年 9 月 18 日，第 2 页。

吕振羽：《保卫武汉与巩固湖南》，《中苏》半月刊第 8 期，1938 年 7 月 1 日，第 3 页。

是以湖南为其争取的重点”。他认为：在平、津、沪等全国大城市沦陷后，随着工业经济文化教育部门的内迁，“湖南在空间地位上”，不仅是国防建设的重点，而且“是创建新的国民经济的中心”。“湖南人应该努力……把湖南创造成为民族产业”和“民族文化的中心”。他指出：在中国近百年来“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中”，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的“湖南人总是站到最前头”，或“作为倡导者”。也正是这些前仆后继的“革命运动”，陶冶和造就了湖南人“民生聪秀，英勇而好进取”，富于“开创”、“斗争”和“牺牲”的“特性”，具有“向外发展”、“刻苦”、“勤奋”、“拼搏”、“奉献”而“有蛮气”的“湖南精神”。他说：“自梁启超以至现在的全国领袖蒋委员长等，皆谓‘只要湖南人不死尽，中国就不会亡国。’”他认为：这是国人对湖南人的最大信赖和殷切期待；在“现在的民族抗战”中，湖南人更要“发扬光大”湖南精神。这些关于湖南的军事战略地位、人文传统和湘人自卫抗战使命的论述，对凝聚三湘人民的爱国心，激励湖南军民卫国保土，产生了积极作用。

此外，吕振羽还就训练和武装湖南民众、兴办抗日文化教育、打击汉奸亲日派的破坏活动、实施抗日民主等，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主张。

## 二 文抗会的主要组织者

文抗会的全称为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，1937年10月成立。

---

吕振羽：《战时的湖南和湖南人》，《前进》周刊第1卷第11期，1937年11月21日，第150页。

吕振羽：《战时的湖南和湖南人》，《前进》周刊第1卷第11期，1937年11月21日，第151页。

吕振羽：《战时的湖南和湖南人》，《前进》周刊第1卷第11期，1937年11月21日，第157页。

吕振羽：《战时的湖南和湖南人》，《前进》周刊第1卷第11期，1937年11月21日，第157页。

它是抗战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发起,以团结抗日为宗旨的全省性的抗日群众团体。其主要成员是在湘的文化教育、新闻出版、文学艺术等各界人士。

七七事变和“八一三”抗战后,平、津、沪、宁等一些文化教育机关相继南迁,大批文化名人、学者纷纷落户长沙。著名学府北大、清华、南开3校,亦于1937年9月8日起陆续迁湘,联合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。此外,南京国立戏剧学校、北平民国大学、国立杭州艺专等校以及中华书局、上海商务印书馆、中央日报社、东方杂志社等,均在此时先后搬迁长沙。

9月27日《力报》登载:“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,京沪平津各学者,各文学家,各戏剧家之来湘者甚多。”从抗战爆发至1937年底,上述各地著名学者文人郭沫若、茅盾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张伯苓、张奚若、朱光潜、冯友兰、陈寅恪、曹禺、余上沅、叶公超、潘光旦、贺麟、汤用彤、郑天挺、晏阳初、陈垣、张季鸾、许德珩、孙伏园、王彦西、吴祖光、梁实秋、熊佛西、张曙、赵元任、钱穆、薛暮桥、高一涵、刘开渠、钱君匋等联翩来湘;吕振羽、田汉、翦伯赞、张天翼、金岳霖、黎锦熙、谭丕摸、杨东莼、皮名举、陈子展、周立波、沈从文、黄芝冈、廖沫沙、魏猛克、罗皑岚、蒋良牧、陈润泉、唐际清等湘籍知名人士亦回归故里;一批在外就读的学子如潘开茨、肖敏颂、曹国枢、杨、黎澍、于刚、曹国智、苏镜、黄绍湘、李锐、杨润湘等也在七七事变前后,从日本、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汉回到长沙。他们与原在长沙的文教界人士李仲融、皮宗石、黄一欧、杨树达、杨卓新、孙伟、胡元、伍蕙农、杨荣国、朱子倬、向培良、姜缙郎等汇合,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据不完全统计:抗战初期各地荟集长沙,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文化名人在700人以上。如此众多文化精英云聚星垣,这在湖南可谓空前盛事。他们是巨大的抗日救亡力量,然而,由

---

《文艺家会集星垣》,《力报》1937年9月27日。

黎维新等:《长沙文化城》,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,第493页。

于他们大多来自异域他乡，刚刚“驻足衡山湘水”，旅途劳顿，又互不熟悉，一时难以组织起来。此前，虽有“由北平、上海回到湖南的一些学生和当地学生一道，开始一些抗日宣传活动，但都不能取得合法保障和公开进行。因此，总的来说，在‘文抗’成立和开展活动以前，湖南还看不到多少抗战气氛，在群众中并没有开展成为抗日群众运动”。

9月初，吕振羽带着“回湘开荒”的神圣使命，从北平回到长沙。同先期回湘的苏镜、萧敏颂、孙伟等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一起，以含光女校、育英小学的读书会、歌咏队为活动据点，组织、发动省会文教界同仁，开展抗日文化宣传，发起成立湖南文抗会。

10月初，旅沪湘籍文教界人士陈润泉、李仲融、廖伯华回长。他们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（简称救国会）的成员。吕振羽十分高兴，随即和他们一道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及湖南现状，在组织湖南文化界参加抗日救亡问题上达成共识，决定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。

为使即将成立的湖南文抗会能取得合法地位，吕振羽等成功地利用了国民党内乙派（何键派）和甲派（CC派）在湖南的矛盾，争取到省主席何键等对成立文抗会的支持，同时，邀请了省会文教界、新闻界名流皮宗石（湖南大学校长）、伍蕙农（湖南大学教授）、鲁立刚（中学校长）、王季范（中学校长）、陈润霖（省教育会会长）、朱石农（湖南《大公报》总编）、康德（《力报》总编）等为文抗会的发起人。

10月9日，省会的“教育、新闻、音乐、戏剧界等同仁”在青年会大礼堂召开“发起人”会议，通过《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缘起》，即日成立筹备委员会，指定吕振羽、翦伯赞、孙伟、李仲融、陈润泉、

---

吕振羽：《记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》，《革命回忆录》第4期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17—118页。

廖伯华、肖敏颂等 11 人为筹备委员，负责起草宣言，会章等事宜。

10 月 17 日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在第一师范礼堂召开成立大会，到会会员 600 余人。“临时主席吕振羽报告筹备之经过及成立大会之重要使命毕，随即推举吕振羽、李仲融、蒋春世、曹冶阳、翦伯赞 5 人为大会主席团”。省主席何键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词：“文化界起来抗战即是真正的抗战”；希望文抗会“充实组织，积极团结，与全国文化界携手，再进一步与世界合作，来充实抗战力量”。大会“通过会章”，“决议工作纲领及宣言交理事会办理”。“吕振羽等 23 人当选为理事”。19 日，文抗会举行第一次理事会，选举吕振羽等 4 人为常务理事。决定设立研究、宣传、组织、总务 4 部，创办会刊《抗战文化》。研究部是文抗会的核心机构，吕振羽兼主任，其使命“是救亡理论的探讨和救亡实践的指导”。

文抗会的《缘起》和《成立宣言》指出：“伟大的民族全面抗战的局面已经展开”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，“不仅在消灭我国国家，奴役我民族，斩绝我历史文化，同时也在毁坏人类文化，扰乱世界和平。”我们的“出路”，“不是解放便是灭亡。”“只要不是汉奸，每个不甘作亡国奴的中国同胞”，“已经无党派、无贫富、无地域、无老少、无性别和职业的区别”，应“紧密地结合起来”，“担荷起民族抗战的任务”，以“保卫祖国、保卫民族、保卫文化”。“基于上述要求和觉悟”，我们特“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”。

《缘起》和《宣言》认为：“战时全民的精神武装和物资武装，实有同等重要。”我们文化工作者应积极投入“抗战文化总动员”，象前方将士一样，用我们文化的武器，进行文化抗战。特别强调：“湖南在空间的地理位置上，随着抗战的发展，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

---

《发起人讨论会》，湖南《大公报》1937 年 10 月 10 日。

湖南《通俗日报》1937 年 10 月 19 日。

文抗会《成立宣言》，《醒师》第 1 卷第 4 期，1937 年 11 月 16 日。

文抗会《缘起》，《民族呼声》创刊号 1937 年 10 月 10 日。

心根据地。”湖南人在长期革命中造就的“湖南精神”；于目前民族抗战“十分有用”；应“从抗战文化的基础上，引导其发挥为现代国家精神，民族精神和世界精神”。《缘起》和《宣言》一再呼吁：“湖南境内的文化工作者”为负起文化抗战的“先锋任务”；应该“消除一切党派的、门户的、地域的……种种自相摩擦的成见，在抗敌救亡这一最高共同利害的原则下，大家紧密的结合起来，形成一新的化学的构成体”；“与全国文化界共同来负起民族抗战的文化任务”。《缘起》和《宣言》汲取了吕振羽《抗战后的新动向》（1937年9月18日）等文的思想 and 论点；吕振羽在《战时的湖南与湖南人》（1937年11月17日）等文，又对《缘起》《宣言》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。这对启迪人们的抗日民族觉醒，激励湖南人弘扬先辈的革命精神，鼓舞文化界团结奋起抗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1937年底至1938年1月，各地又有“很多文化人来到湖南”。为“推进”湖南文化抗战工作，1月24日，文抗会邀请“未加入文抗会的文化人”，举行“茗叙”（茶话会）“交换意见”。“教育界、戏剧界、作家、新闻界、艺术界人士”计100余人聚会，“大家相继发言”，气氛“备极欢洽”。“过去许多教育界、新闻界分子还不曾加入文抗会，现在也热烈地和文抗会携起手来一致奋斗了”。此时，文抗会会员增加到800余人，“直接间接影响的团体已有35个，人数共计1000人左右”。全省有36个县同文抗会建立了联系，常德、岳阳、桃源、湘潭等地要求成立文抗分会。湖南有影响的报刊，如《观察日报》《抗战日报》《湖南通俗报》湖南《大公报》《前进》周刊、《民族呼声》旬刊、《抗战文化》月刊，以及稍后创刊的《中苏》半月刊等，其总编或社长，大都是文抗会的理事或会员。这些报刊高举抗

---

《文化界举行茗叙》，湖南《大公报》1938年1月25日。

曹伯韩：《几点零碎意见》，《抗战文化》第4号会员大会特刊，1938年2月16日。

《郭光洲关于湖南近况的报告》（1938年3月28日），《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》，湖南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48页。

文抗会《组织部工作报告》，《抗战文化》第4号。

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,突出抗日救亡的主题,是中共指导抗战的舆论阵地,是动员民众支前参战的号角。

湖南文抗会成立的头4个月,在吕振羽等领导下,全部工作“活跃而有生气”,在湖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中,的确起到了“先锋队”的作用。随着抗战与时局的发展,文抗会要求抗战文化工作者“跑出长沙的城圈”,把重点移到“乡村市镇”,不要“停留在知识界范围”,应当“深入工农群众”。为指导这一重大转变,吕振羽以文抗会研究部名义,在湖南《大公报》开辟《农村工作》专栏,亲自写了《发刊辞》。认为中国持久抗战“决胜之中心”,“不在大城市”,而在“全国之乡村”;争取抗战的胜利“首先在于使无数万农民都成为有组织有训练的战斗员”。此后他在《中苏》半月刊上发表《动员工作在农村》的专论,再次强调“动员农村”是总动员的“主要部分”,只有“农村同胞”“参加民族抗战”,“才能取得民族抗战最后胜利,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惨祸”。

形势的发展要求文抗会修订工作大纲,“扩大”、“健全”、“充实”其组织机构。1938年2月16日,文抗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在长沙举行,400多会员与会,选举吕振羽、杨东莼、康德、李仲融、翦伯赞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;大会制定了《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工作纲要》,强调抗敌文化工作要“面向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村的农民”;改选了理事会,新增理事70名,吕振羽、陈润泉、孙伏园、田汉等23人当选为常务理事,实现了在湘文化人的抗日大联合;新增了训练、青年、妇女、救济、慰劳5个部,组织机构较前完善。第二次会员大会使“文抗会充满了活力与生机”,“可说是文抗会的转折点”。由于文抗会的影响日益扩大,参加和拥护文抗会的民众越来越多,

---

李仲融:《湖南文抗会之过去与现在》,《观察日报》1938年8月27日。

翦伯赞:《当前抗战文化的任务》,曹伯韩:《几点零碎意见》,《抗战文化》第4号。

吕振羽:《“农村工作”发刊词》,湖南《大公报》1938年1月18日。

吕振羽:《动员工作在农村》,《中苏》半月刊,第12期,1938年9月1日,第14页。《特刊之辞》,《抗战文化》第4号。

因而也招致了国民党CC派顽固分子的嫉恨。他们造谣攻击文抗会要“统治湖南文化界”；“吕振羽等操纵了文抗选举”；理事会“全由吕振羽、廖庶谦(伯华)所操纵”；“文抗会全是C.P的”。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乘文抗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增选理事之机，把陈大榕、周邦式、袁野秋等一批CC派顽固分子强行塞进理事会，用以“牵制”中共党员，“打击或排斥革命分子”，“挑拨”内部“关系”，制造摩擦事件，扰乱文抗会的工作。随着武汉会战的开始和长沙局势紧张，“反动势力对文化运动渐次实行压迫”，“许多外来文化人离开了湖南”。约从1938年6月起，“极盛一时”的湖南文化抗战，逐渐走向衰落，从而也就“失掉了长沙文化中心”。

文抗会从发起到成立，从文件起草到《工作大纲》实施，从两次会员大会的筹备、召开到各项活动的开展，吕振羽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“实际上负责该会的全面工作”，是文抗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。

### 三 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创办人

塘田战时讲学院，创办于1938年，位于湘中邵阳县内，是一所培养基层抗日干部的学校。

1938年5、6月间，日军相继侵占了厦门、合肥、徐州、安庆和开封，对武汉形成了战略围攻之势。一向关注抗战情势的吕振羽，预见到敌人势必集中兵力进攻武汉，湖南势将空前紧张。他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，呼吁人们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，力主湘鄂赣边各

---

吕振羽：《记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》，前引书，第120、124页。

《郭光洲关于湖南近况的报告》，《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》，第48页。

《聂洪钧关于湖南党三个月工作的总结》（1938年9月6日），同上书，第73、63页。  
《任作民关于湖南诸般情况及党的工作报告》（1940年2月21日），《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件选编》，第241页。

陈允恭等：《一石压江流——史学家吕振羽》，《人物》1981年第1期，第31页。

县农村“建立强有力的游击区”，组织农民抗日“自卫武装”保乡保土”。他还和翦伯赞等以名人学者身份，致信湖南省主席张治中，要求立即动员、组织和武装全省民众，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”，保卫湖南。他又向中共湖南省委建议，创办一所战时讲学院，培养抗日干部，为保卫湖南作准备。他提议讲学院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出现，成立一个董事会，聘请国民党一些名人显要参加。徐特立和中共湖南省委十分赞同吕振羽的意见，并“写信给毛泽东、洛甫”，请求中央“派几个干部”来湖南，“将陕北公学和抗大的学风”带到讲学院，“以便在湖南进行抗战教育”。这个请求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。6月，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派吕振羽到邵阳负责筹办这所学校。邵阳地处湘中，钟灵毓秀，是魏源、蔡锷的故乡，而吕振羽又是邵阳县（原属武冈县）金称市乡。当沪宁失陷和武汉危急后，国民党的湘籍将领刘建绪、李觉，党政要人覃振、赵恒惕、刘岳厚，第6区（邵阳）专员公署专员李琼，保安司令岳森，武冈县长林拔萃等，有抗日保湘的爱国意向，计划在“武冈一带”建立“游击根据地”，发起地方武装，一旦“敌人进攻时”，即开展抗日“游击战争”。刘岳厚将这一愿望告诉了吕振羽，并表示“积极赞助”和“支持”“建立塘田讲学

---

吕振羽 1938年5月—6月间，在湖南《大公报》《中苏》半月刊等报刊上，发表《目前国际形势的认识》《敌国内阁的改组和今后战局的估量》《保卫武汉与巩固湖南》等文，阐述了以上观点。

邓晏如：《忆塘田战时讲学院》（1983年7月）一文说：“1938年6月，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，根据吕振羽同志的提议……决定在武冈县塘田寺创办塘院，并派吕振羽同志负责筹备。”（见《中共邵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文件（油印稿）》邵征发（1984年）3号，第60页。）邓在《深切怀念吕振羽同志》一文中又说：“塘田战时讲学院，是吕振羽同志向中共湖南省委提议创办的。”（见《吕振羽和中国历史学》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6页。）高文华（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）说：“1938年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是吕振羽同志提出来的，经省委研究同意。”（见《访高文华同志纪录》，1984年6月16日，《中共邵阳地委党史征集办公室文件》，第63页。）

《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》（1938年10月），《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》，第12页。

院”。吕振羽利用抗战初期国共再次合作出现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外部环境,通过各种统战关系,争取了国民党元老、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出任塘田讲学院院长,湖南省临时参议会会长赵恒惕任该院董事会董事长。又经过覃振、赵恒惕、刘岳厚,争取了省主席张治中、专员李琼、保安司令岳森、县长林拔萃以及当地开明绅士吕遇文、吕惠阶、李梯云等支持创办塘院,出任荣誉董事。同时借用席宝田(清末中宪大夫、太子少保)在塘田寺的“塘田别墅”作校址,校名“塘田战时讲学院”。筹办塘院时,CC派教育厅长朱经农一再作梗,不予“立案”。后由司法院长、省主席出面支持,朱经农也就无可奈何了。

8月底,塘田战时讲学院全部筹备工作基本就绪,随即开始招生,通知各地中共党组织、各县教育局,选派青年学生来校学习,确定9月15日正式开学。中共湖南省委还从文抗会等抗日救亡团体派出张天翼、杨卓然、雷一字、林居先、李仲融等共产党员,陈润泉、曹伯韩、王西彦等党外人士来校任教。院长覃振德高望重,“不管具体工作”,“副长吕振羽负实际责任,领导全面工作”。塘院管理体制为五部一室:教务部教务长先后为张天翼、曹伯韩、陈润泉;研究部主任李仲融;学生生活指导部主任先后有雷一字、游宇;补习部主任雷一字(兼)、陈啸天;事务部主任吕遇文;院长办公室秘书王时真(江明)。全院领导核心是吕振羽(组长)、张天翼、杨卓然组成的党的3人小组。教职员多数人是中共党员,很多人是文教界的硕彦和名家。

塘田战时讲学院是一所新型的学校。它以“抗大、陕公的办学

---

《郭光洲关于湖南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》(1938年11月30日),《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》,第94页。

杨卓然:《塘田战时讲学院琐记》,载《中共邵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文件》,第58页。此外,邓晏如《深切怀念吕振羽同志》一文称:吕振羽“以副院长的名义主持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工作,是全院的实际负责人”;《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》(1938年10月)中说:“我们的同志吕振羽在宝庆(今邵阳)办了一个学校,名战时讲学院。”

院”。吕振羽利用抗战初期国共再次合作出现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外部环境,通过各种统战关系,争取了国民党元老、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出任塘田讲学院院长,湖南省临时参议会会长赵恒惕任该院董事会董事长。又经过覃振、赵恒惕、刘岳厚,争取了省主席张治中、专员李琼、保安司令岳森、县长林拔萃以及当地开明绅士吕遇文、吕惠阶、李梯云等支持创办塘院,出任荣誉董事。同时借用席宝田(清末中宪大夫、太子少保)在塘田寺的“塘田别墅”作校址,校名“塘田战时讲学院”。筹办塘院时,CC派教育厅长朱经农一再作梗,不予“立案”。后由司法院长、省主席出面支持,朱经农也就无可奈何了。

8月底,塘田战时讲学院全部筹备工作基本就绪,随即开始招生,通知各地中共党组织、各县教育局,选派青年学生来校学习,确定9月15日正式开学。中共湖南省委还从文抗会等抗日救亡团体派出张天翼、杨卓然、雷一字、林居先、李仲融等共产党员,陈润泉、曹伯韩、王西彦等党外人士来校任教。院长覃振德高望重,“不管具体工作”,“副长吕振羽负实际责任,领导全面工作”。塘院管理体制为五部一室:教务部教务长先后为张天翼、曹伯韩、陈润泉;研究部主任李仲融;学生生活指导部主任先后有雷一字、游宇;补习部主任雷一字(兼)、陈啸天;事务部主任吕遇文;院长办公室秘书王时真(江明)。全院领导核心是吕振羽(组长)、张天翼、杨卓然组成的党的3人小组。教职员多数人是中共党员,很多人是文教界的硕彦和名家。

塘田战时讲学院是一所新型的学校。它以“抗大、陕公的办学

---

《郭光洲关于湖南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》(1938年11月30日),《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》,第94页。

杨卓然:《塘田战时讲学院琐记》,载《中共邵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文件》,第58页。此外,邓晏如《深切怀念吕振羽同志》一文称:吕振羽“以副院长的名义主持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工作,是全院的实际负责人”;《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》(1938年10月)中说:“我们的同志吕振羽在宝庆(今邵阳)办了一个学校,名战时讲学院。”